

教育错配、正规就业与我国家庭相对贫困

——基于 CFPS 个人与家庭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鸣芳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辽宁 沈阳 110167

【摘要】教育匹配程度不仅对个人发展和家庭经济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减贫工作也具有战略性意义。本文使用2018年CFPS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教育错配与相对贫困的关系,并将正规就业作为中介变量评估了教育错配对贫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教育过度促进脱贫,教育不足则对减贫呈负向效应,而且教育不足的负向效应大于教育过度的正向效应。教育过度通过促进正规就业帮助劳动力脱离相对贫困,而教育不足阻碍正规就业从而对减贫产生负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城镇居民,教育错配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教育过度对高学历者脱贫有负向效应,对低学历者却有正向效应。因此,在后脱贫时代我国减贫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解决农村居民教育不足与高学历者教育过度的问题,并关注劳动力的正规就业。

【关键词】教育过度;教育不足;相对贫困;正规就业;中介效应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21年初,习主席宣告我国已全面脱贫,表明我国不再有绝对贫困群体,贫困也被重新定义为相对贫困。然而,由于相对贫困的隐蔽性和脆弱性,返贫情况很可能发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扶贫必须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教育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关键,虽然国民受教育程度有明显提升,但教育错配的风险也增加了。教育错配是指劳动力所受教育和工作所需教育程度不匹配,分为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刘金菊(2014)^[1]测算出中国总体教育过度率从1990年的7.24%上升到2010年的28.16%,表明我国存在明显的教育错配现象。

随着我国高校扩招速度增大,毕业生快速增加而相应岗位有限,学历贬值、岗位与专业相关度低等现象严重。职业流动理论认为过度教育只是劳动者想积累工作经验,为职业转换做铺垫的临时性现象;但Sloane(1999)^[2]认为教育过度者只是不同过度状态间的转换;岗位竞争理论认为劳动者需要更多教育投资进行岗位竞争;而胥秋(2006)^[3]认为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是教育错配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经济高速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国家更需要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和劳动力供需不匹配,许多员工的专业素养没有达到相应要求,也导致了教育错配发生。

在后脱贫时代背景下,鲜有对教育错配和相对贫困关系的直接研究。余诗琪(2018)^[4]发现教育过度者和不足者的教育回报率分别低于和高于匹配者,城市-农村移民的教育匹配率低于城镇居民。多数研究赞同教育不足对居民收入有负向影响,对于教育过度的研究更丰富,其教育收益率的差距随着收入提高逐渐扩大(余诗琪),也随着学历水平提高而增大(李根丽等,2020)^[5]。

脆弱性是相对贫困的主要特征,除教育投入,拥有稳定收入也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而稳定收入和生活保障来源于就业。李根丽等发现教育过度和不足分别显著降低和增加了劳动者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而人力资本配置通常偏向正规就业市场,正规就业能提供更加稳定的收入。Gong(2002)^[6]发现工作差异主要由受教育年限造成,由此本文合理推测教育过度和不足通过就业机制对贫困产生影响。

目前对教育错配的研究集中于教育过度,一些研究仅将教育过度当作内生变量,忽略了教育不足、不同岗位的教育要求等内生性问题,估计可能存在较大偏误;现有研究聚焦于教育错配对收入的影响或教育年限对贫困的影响,并没有关于教育错配与

相对贫困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

针对教育错配现象和城乡二元结构,后脱贫时代我国应如何推进减贫工作,尽早达成“共同富裕”目标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聚焦于教育错配的两种情况——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研究其基于正规就业对相对贫困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创新可能有以下三点:一,利用Logit模型研究了后脱贫时代教育错配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二,研究了基于正规就业中介效应下教育错配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三,在城乡和学历层次的不同维度对比研究相对贫困情况。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本文主要考察我国城乡居民教育错配、就业与家庭贫困的情况,所以使用契合本文的成人和家庭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原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将成人样本与家庭样本匹配;(2)研究限制在中国城市和乡村两类地区;(3)剔除无效和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4)为平滑数据,对家庭年教育支出和家庭存款数值较大的变量取对数处理。最终获得了8620份有效样本,城市、乡村居住人口占比分别为50.22%和49.78%,样本中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家庭占比68.3%。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是否相对贫困,本文衡量贫困的指标参考欧盟衡量成员国相对贫困的中位收入法,将收入水平低于中位收入60%以下的人口划为相对贫困人口。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教育错配,分为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

教育匹配程度是指劳动者所受教育和从事工作所需教育的匹配程度。目前测量过度教育的方法有三种:主观评价法、工作分析法和经验统计法。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了最直观、准确性高的主观评价法来衡量教育匹配程度。

本文研究对象已完成的最高学历从低到高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以及博士。根据实际学历与受访者对问题“从知识和技能的角度上讲,您认为胜任这份工作实际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的回答计算出受访者的教育匹配程度,将数据重新处理,差值为正即教

育过度, 为负即教育不足, 为零即教育适配, 本文研究教育过度和不足。

2.2.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是否正规就业。借鉴李振刚等(2020)^[7]对于正规就业的分析, 本文从就业单位与就业者的关系及就业者享受的福利出发, 将正规就业者定义为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至少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种保险的劳动者。

2.2.4 分类变量

本文设置了表示社会环境特征的居住地变量和表示个人能力的学历水平变量, 并将高中及以上学历定为高学历水平, 否则为低学历水平。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poverty	是否相对贫困; 贫困poverty=1; 非贫困poverty=0	0.317	0	1	0.465
核心解释变量	edus	教育过度 edus=1, 否则edus=0	0.466	0	1	0.499
	edul	教育不足 edul=1, 否则edul=0	0.169	0	1	0.375
中介变量	job	是否正规就业; 正规就业 job=1; 非正规就业job=0	0.109	0	1	0.312
控制变量	gender	户主性别: 男=1, 女=0	0.602	0	1	0.489
	unhealthy	户主健康状况: 不健康=1, 健康=0	0.15	0	1	0.357
	marriage	户主婚姻状况: 已婚=1, 未婚=0	0.92	0	1	0.271
	fsize	家庭人口规模	3.607	1	21	1.889
	eguexp	家庭年教育支出	4.237	0	12.429	4.348
	sav	家庭存款规模	7.216	0	15.761	4.678
分类变量	urban	居住在城市/乡村; 城市=1, 乡村=0	0.502	0	1	0.5
	edubg	学历水平; 高学历=1, 低学历=0	0.266	0	1	0.442

2.3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2018年CFPS截面数据, 以是否相对贫困为被解释变量, 以教育错配为核心解释变量, 估计教育错配对贫困的直接影响。由于是否相对贫困为二值变量, 因此构建Logit回归模型, 模型如下:

$$p(poverty_i = 1) = F(\alpha + \beta_1 edu_{j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j = s, l \quad (1)$$

式中, $poverty_i$ 表示第 i 个家庭的相对贫困状况; edu_{ji}

表示第 i 个家庭就业状态的劳动力是否教育过度或不足; X_i 为

控制变量, 包括户主及家庭特征变量; ε_{ij} 为随机误差项,

α 、 β_1 、 β_2 为待估参数。

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到, 教育错配不仅会直接作用于贫困, 而且会通过就业状况对贫困程度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将是否正规就业设定为中介变量, 并纳入式(1)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参考温忠麟等(2014)^[8]的研究, 中介效应成立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①在未纳入中介变量前, 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 ②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显著; ③在控制中介变量后, 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降低。本文构建模型(2)来验证第二个条件, 具体模型如下:

$$p(job_i = 1) = \alpha + \beta_1 edu_{j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j = s, l \quad (2)$$

式中, job_i 为中介变量, 表示第 i 个样本是否正规就业。

若 β_1 系数估计结果显著, 则说明教育过度和不足对正规就业影响显著, 即满足中介效应的第二个条件。

然后, 本文构建模型(3)来验证第三个条件:

$$p(poverty_i = 1) = F(\alpha + \beta_1 edu_{ji} + \beta_2 job_i + \beta_3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式中, β_1 若的回归结果比(1)的结果显著性下降或变得

不显著, 且 β_2 的结果显著, 则满足中介效应的第三个条件。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不同教育匹配程度下的贫困比例排序: 教育不足>教育适配>教育过度。其中, 教育不足时贫困发生比例明显高于教育适配和过度情况下的, 这可能是因为教育不足是贫困家庭的特征, 而教育过度时贫困发生比例甚至小于适配时的, 可能是因其所需教育成本更多, 能承担多余成本的家庭条件更好。

不同教育匹配程度下的正规就业比例排序: 教育过度>教育适配>教育不足, 教育适配和过度时正规就业比例基本相同, 即学历提升时得到正规工作的概率更大, 一旦达到适配后, 学历继续提升并不能明显增大正规就业的概率。

表2 不同教育匹配程度下贫困与就业情况

	相对贫困均值	标准差	正规就业均值	标准差
教育不足	0.377	0.485	0.066	0.249
教育适配	0.323	0.468	0.116	0.320
教育过度	0.290	0.454	0.119	0.324

3.2 基准回归: 教育错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

表3和表4给出了教育过度和不足对家庭贫困的影响。由于Logit模型的非线性特征, 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而非回归系数。

从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教育过度与贫困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0.051), 即教育过度程度越高, 家庭贫困可能性越小。这与李晓嘉(2015)^[9]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

致的，即教育年限增加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脱离收入贫困。

教育过度带来工资惩罚效应但依然有助于减贫的原因如下：

首先，教育过度发生时劳动者对知识的掌握能力相应提升，纵使薪资不能与实际教育水平匹配，但更开阔的眼界、更有竞争力的个人背景、更强的思辨能力和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都有助于其脱离贫困；相比教育不足，教育过度有助于推进开发式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其次，依据信号及筛选理论，对用人单位来说，教育反映员工培训成本的高低，教育过度虽然不一定带给劳动力匹配的岗位，但能带给其更多就业机会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同样有利于之后的工作转变。

而教育不足的系数为0.057，教育不足程度越高，家庭越可能贫困，同时教育不足对脱贫的负效应大于教育过度的正效应。这表明，教育过度虽促进减贫，但并不是最高效的减贫方法，“学历竞赛”还会浪费社会资源。所以，减贫工作应聚焦于解决教育不足问题，最大程度发挥人力资本脱贫的作用，而不是一味提升学历。

综上所述，教育过度虽存在工资惩罚效应，但学历提升依然有助于脱贫；相反，教育不足教育收益率较高，却阻碍脱贫。教育减贫应注重教育投入的力度，解决教育不足带来的效益大于教育过度带来的效益。

表3 教育匹配程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基准回归

变量	教育过度	教育不足
Edu	-0.051*** (0.010)	0.057***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LR chi2	988.10	984.70
Prob > chi2	0.0000	0.0000
Pseudo R2	0.0919	0.1282
N	8620	862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所报告系数均为边际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Edu表示教育错配情况，即edus和edul，下文中表格同样如此。

3.3 中介效应：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提升人力资本的开发式减贫目的，本文进一步研究教育错配影响贫困的机制，将是否正规就业作为中介变量。表4和表5列示了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分别单独放入模型以及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教育过度促进正规就业，而教育不足显著阻碍正规就业，加入中介变量后，教育过度和不不足的边际系数绝对值都变小，说明正规就业在教育过度和不不足对贫困影响中都存在中介效应。

在我国城乡、城市二元背景下，存在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两种

表4 教育过度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变量	对相对贫困直接影响	对正规就业的影响	对相对贫困间接影响
edus	-0.051*** (0.010)	0.412*** (0.069)	-0.040***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chi2	984.70	703.83	1374.47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1282	0.1099	0.1282
N	8620	8620	8620

注：该回归中正规就业边际系数是-0.450*** (0.031)

类型，回归结果中正规就业对贫困的边际影响系数是-0.450，意味着正规就业有助于减贫。正规部门中存在更明显的“门槛”限制 (Farber, 1999)^[10]，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收益率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的，而失业率更高，在有稳定且更高的收入时，劳动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大减小。所以更高的教育匹配程度通过增加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推进减贫工作的进程。

表5 教育不足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变量	对相对贫困直接影响	对正规就业的影响	对相对贫困间接影响
edul	0.057*** (0.012)	-0.071*** (0.069)	0.043*** (0.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chi2	984.70	719.73	1371.79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1282	0.1124	0.128
N	8620	8620	8620

注：该回归中正规就业边际系数是-0.450*** (0.031)

3.4 异质性分析

3.4.1 城乡异质性分析

依据表6中对城市、农村样本的估计结果，教育过度对农村居民脱贫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城镇居民的，教育不足对农村居民减贫的阻碍作用也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同时，教育不足对农村居民的负效应比教育过度的正效应大，而教育过度对城镇居民的正效应比教育不足的负效应大。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一方面，教育错配带来的影响远大于城镇居民的，统计显示，农村的教育水平普遍更低于，基于上文分析，受教育水平提升促进了正规就业从而减少贫困，参考李根丽等的研究，随学历提升，正规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差距增大，这可以解释为何城乡间教育错配对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差距巨大，同时也说明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教育投入是重要的减贫手段；另一方面，教育不足对农村贫困的负效应更大，参考李晓嘉的研究，学历提升主要通过增加非农业收入促进农村低收入家庭脱贫。这说明尤其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适度增加多样化的教育投入，提升非农业就业比例可以高效减贫，而不是一刀切地提高学历。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教育过度的正效应却大于教育不足的负效应，因为学历更多被作为信息甄别的信号，在竞争更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应聘者更容易得到正式工作，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减小，所以城市对于学历的要求更高，即使实际工作与受教育水平并不匹配。

3.4.2 学历水平异质性分析

如图6所示，教育过度增加了高学历者落入贫困的可能性，却增加了低学历者减贫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存在三种可能使得高、低学历者呈相反结果。

首先，范皓皓 (2013)^[11]发现来自弱势家庭的劳动力出现过度教育的概率更高，而低学历者出现在经济较差、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他们来说，过度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可以弥补原生家庭不足的社会资本，所以教育过度对低学历者减贫有贡献。

其次，扩招使人们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提升，但同时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增长迅猛，超出社会需求，高学历就业者的竞争更加激烈，学历更多表现“信息传递”的作用，但对低学历者来说，过度教育表现为能力的提升。

另外,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特征是学科专业设置,我国高校学科结构设置存在不合理,社会更需要拥有综合高素质和雄厚基础知识的人才,而专业划分过细使劳动力的知识结构缺失,知识面狭窄,综合能力达不到社会要求,从而影响自身就业和对社会的贡献。

而基于教育不足的异质性检验拟合结果不好,学历高低对贫困影响不显著,说明教育不足时学历高低不会影响贫困,这也印证了余诗琪“教育不足时教育收益率会增加”的观点。不论是处于高学历还是低学历水平,在获得高于自己学历水平的工作时,回报大于教育成本。但一方面,教育不足者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当就业单位了解到其真实水平或完善考核机制后,由于信息不对称被录用的低能力者很可能会丢掉这份收益较高的“饭碗”,而某些行业掌握特定技能的劳动力稀缺,大量新劳动力涌入后,教育不足者很可能被取代;另一方面,教育不足者在特定领域或相应层次上能力较弱,会影响国家人力开发与技术升级,造成资源浪费,从而反作用于贫困增加。

表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教育过度				教育不足	
	城市	农村	高学历	低学历	城市	农村
edu	- 0.025** (0.011)	- 0.045** (0.015)	0.052*** (0.013)	- 0.030** (0.012)	0.014* (0.014)	0.057*** (0.01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chi2	384.21	323.12	183.44	599.81	379.99	325.01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1013	0.0544	0.1342	0.0695	0.1002	0.0547
N	4320	4,300	2,149	6,471	4320	4,300

4 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治理更加复杂,我国的减贫事业任重道远。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测算了教育错配基于正规就业的中介效应应对城乡及不同学历水平居民贫困的影响。

研究发现:教育过度和不足通过正规就业的中介效应分别对减贫产生正向和负向效应,而且教育不足的负效应大于教育过度的正效应;相比城镇居民,教育错配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同时教育过度对高学历者脱贫有显著负效应,对低学历者却有显著正效应。该结论支持了筛选理论,教育作为“信号”被劳动力市场甄别,高学历者并不能获得相应岗位和薪水,而对于低学历者来说,得到一份稳定工作的效用更大。

综上分析,在后脱贫时代,我国减贫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解决农村居民教育不足与高学历者教育过度的问题,并聚焦于我国劳动力的正规就业。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人力资本减贫的重心应放在解决教育不足上,应针对性地对群体划分而不是一刀切地进行教育投资。对于城乡的不同特征,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提升学历层次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注重综合素质提升,提高岗位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城市移民,要从生活条件和子女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做好他们的城市融入工作,为其建立提供就业信息的社会网络。

第二,虽然教育过度降低了贫困的可能性,但能投入更多教育成本的家庭本身陷贫的可能性较小。教育过度可以通过提

升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促进减贫,但实证结果显示教育过度并不是减贫的最好手段,还可能会浪费社会资源。政府应采取能缓解“学历竞赛”现象的手段,引导技能和综合素质的竞争。

第三,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在中国教育规模迅猛扩张的情况下,政府首先要改革教育体系,加强教育层次性设置的同时应提升教学质量,注重毕业生实际能力的掌握程度,高校可加强与用人单位的交流,紧跟人才需求标准调整培养计划,避免教育过剩,同时加强毕业生综合素质培养,关注学生的当前就业与长期职业生涯发展;从需求端出发,政府应完善就业体系,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挖掘内需、提供更多新业态就业岗位,促进不同层次劳动力充分就业。

第四,促进劳动力正规就业不能急于求成,非正规就业也是一种劳动力根据自身特点与综合因素选择的过度就业手段,强制就业正规化反而会带来负面效应。对于非正规就业者,政府应增加劳动合同签订率和保险参保率等,完善劳动权益保护,使非正规就业情况下的劳动力也能有稳定的收入。例如,可以适当提高

最低工资水平,减少被迫性的非全日工作等隐蔽性失业发生,加强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有效匹配等。

参考文献:

- [1] 刘金菊. 中国人口的教育过度: 水平、趋势与差异[J]. 人口研究, 2014, 38(05): 41-53.
 - [2] SLOANE P J, BATTU H, SEAMAN P T. Overeducation, undereducation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arket [J]. Applied economics, 1999, 31(11): 1437-1453.
 - [3] 胥秋. 从过度教育现象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失衡[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6(1): 10-13.
 - [4] 余诗琪. 中国城镇教育职业错配及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D]. 暨南大学, 2018.
 - [5] 李根丽, 尤亮. 教育错配、非正规就业与工资惩罚效应[J]. 财政研究, 2020(12): 103-118+123.
 - [6] Gong, X., Soest, A. (2002), Wage Differentials and Mobility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Mexico. Labour Economics. 9(4): 513-529.
 - [7] 李振刚, 张建宝. 正规与非正规: 就业模式对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来自八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6): 29-44.
 - [8]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05): 731-745.
 - [9] 李晓嘉. 教育能促进脱贫吗——基于CFPS农户数据的实证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04): 110-122+187.
 - [10] Farber, H. S. (1999), Alternative and Part-time Employment Arrangements as a Response to Job Lo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7002.
 - [11] 范皑皑. 高校毕业生的学历与岗位匹配——基于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经济, 2013(2): 18-24.
- 作者简介: 张鸣芳(2000.1.12—), 女, 汉族, 山西省阳泉市, 本科生, 经济学专业。